

黃君良著

儒簡思想研究

[illegible]

郭店

黃君良 著

儒簡思想研究

遼寧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郭店儒簡思想研究/黃君良著. --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610-6318-7

I. ①郭… II. ①黃… III. ①竹簡文—研究—楚國 (? ~前 223) ②儒家—研究 IV. ①K877.54②B222.0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1) 第 081225 號

出 版 者: 遼寧大學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

(地址 沈陽市皇姑區崇山中路 66 號 郵政編碼 110036)

印 刷 者: 遼寧彩色圖文印刷有限公司

發 行 者: 遼寧大學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

幅面尺寸: 148mm×210mm

印 張: 9.25

字 數: 240 千字

出版時間: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時間: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責任編輯: 劉東杰

封面設計: 鄒本忠 韓 實

責任校對: 齊 悅

書 號: ISBN 978-7-5610-6318-7

定 價: 25.00 圓

聯繫電話 024-86864613

郵購熱線 024-86830665

網 址: [http //www lnupshop com](http://www.lnupshop.com)

電子郵件 [lnupress@vip 163 com](mailto:lnupress@vip.163.com)

Preface to 郭店儒簡思想研究 by 黃君良

The discovery of the Guodian bamboo-slip manuscripts in 1993 marks a new direction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Never before were modern scholars able to study a significant collection of philosophical texts exactly as the texts were copied in the late fourth century B. C. It has been more than a decade since publication of the complete Guodian manuscripts in 1998, and in this preface I would not be able to summarize the outpouring of new research inspired by the manuscripts. Looking back to 1998, the state of the field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in 2011 has changed in two obvious ways. First, it is impossible to isolate the study of the famous transmitted philosophical texts (such as 論語, 墨子, 老子, 莊子, 孟子, 荀子, 韓非子) from the new manuscript evidence. Amidst the diversity of viewpoints expressed by different scholars regard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uodian philosophical texts, there is unanimity that the texts supply essential clues to the conditions that spawned the growth of philosophy in China between the sixth and third centuries B. C. Second, as ancient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texts have continued to come to light in the Warring States Chu bamboo slips acquired and published by the Shanghai Museum and most

recently in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s, the Guodian texts take 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first stage of an ongoing revolution in modern research o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The richness of the manuscript evidence makes possible a comprehensive revision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the time of Confucius to the founding of the Qin empire.

Dr. Wong Kwan Leung's study of the Guodian Confucian texts represents the best quality of scholarship to emerge from the new historians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It was my privilege to guide Dr. Wong's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where he received his Ph. D. in 2006 with a dissertation on "Early Confucianism: A Study of the Guodian Confucian Texts." As his teacher I have long known Dr. Wong's talent for combining careful research with original speculation. He has full command of the transmitted sources as well as the new manuscript sources. Moreover, as a historian he probes all available evidence to determine the full social, cultural,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 behi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as in the Guodian Confucian texts. Whether he is citing the 左傳 or the 三禮, his use of the transmitted sources to demonstrate the exact significance of a passage from a Guodian text is always precise and illuminating. If I were asked to identify the single most admirable quality of Dr. Wong's book, it would have to be his unflinching commitment to proving that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Guodian Confucian texts provides the basis for addressing the larger issues in early Confucianism. As a result, Dr. Wong demonstrates the necessary role of manuscripts in the field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as it is practiced today, and he lays important groundwork for new directions in a field that is undergoing exciting changes as we anticipate more manuscript discoveries that must still lie in the future.

Donald Harper 夏德安

Centennial Professor in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6 March 2011, in my office at the University)

儒家學說的歷史命運（代序）

——為黃君良博士《郭店儒簡思想研究》作

毛慶者

在歷史悠久、輝煌燦爛的中國傳統文化中，作為理論形態的主要有儒家學說、道家學說和後來的禪宗學說。其影響當以儒學為最。

儒家學說產生於亂世，應用於治世。漢、唐、宋、明固然以儒家為治國之根本，連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元、清兩代也重儒學，也以儒學為政權的理論支持。自漢武獨尊儒術，垂二千年，以五經確立根本，以學校養育士人，以科目選拔棟樑，以蒙學啟迪童智，以廊廟實施仁政，以德行考察吏治，以宗族敘其倫常，以禮節安排長幼，以藝文推行風化，以教化協和萬邦，其核心價值取向乃是儒家學說。如果說道家、佛家只在山林寺廟，那麼儒家學說已入朝野上下，無所不在，彌漫於人際關係各個方面，因而成為中華文化的主宰和靈魂。長期影響所及，則進而滲入民族精神，塑鑄民族性格。和西方中世紀政教合一的黑暗統治制度不同，中國兩千年的宗法社會所實行的是政學結合的體制。儒學借政權見用於當世，政權靠儒學作理論闡明，兩者相依相存。儒家思想學說培養和造就一代代人才，按儒家學說法先王建立的政治體制，對維護和推進兩千年封建統治影響巨大，其學說自身亦得以充實和發展。作為學說的經典，由五經、四書五經到十三經，都是歷代士人奉讀的重要著作。

儒家學說在中國有過近兩千年顯赫的歷史。但是到了近代，儒學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價值卻一落千丈，從被懷疑、輕視、冷落到被批判，凡一百四十餘年。儒學命運在兩千年和一百四十年的

歷史反差，不是偶然現象，而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1840年西方發動的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展現了一個令國人驚異的西方世界。隨著西方科技文明和人文學術的傳入，從此開始了西學與中學的對立和衝突。列強入侵和清廷腐朽是近代社會兩大主要問題。1850年洪楊太平軍起義，給腐朽的清廷以沉重一擊。1898年自上而下的戊戌變法以百日維新失敗而告終。1898年建立京師大學堂，1905年廢除科舉，宣告1300年以儒學取士的選舉制度的終結，而用新學校培養人才的方式取代。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統治，儒學所賴以依附生存的實體已不復存在。但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主義思想並未隨之消失，末代皇帝退位了，新的皇帝還會登臺。1906年洪憲帝制破滅，預示著一場徹底地反對封建主義思想的鬥爭必然到來。從1917年發軔到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的批判鋒芒，直指幾千年的封建思想，儒家學說及其創始人孔子首當其衝，受到前所未有的批判和否定。再過二十年，即上世紀40年代初，睿智的哲人在高度評價五四運動意義的同時，也指出它在方法論上“好的一切皆好，壞的一切皆壞”的偏頗；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則明確地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要予以總結”的科學論斷。然而當時抗日鬥爭正值艱難階段，抗日勝利之後是人民解放戰爭，再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相當長時期，中國人民面臨著打碎一個舊世界，建立並鞏固一個新世界，避免其得而復失的鬥爭。儘管其間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所重視，對文化遺存有所保護，但是四十年代提出的“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要予以總結”的工作卻沒有展開。直到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儒家學說在中國復蘇時期已經到來，為總結和研究孔子及其儒家提供了適宜環境和良好契機。

從1840年到1980年，縱觀中國140年儒學衰敗史，不難看出，儒學價值的低落，與清王朝式微、坍塌，與中國幾千年封建體制的最後終結，與儒學自身從封建王朝剝離是並行的過程。從1840年開始的兩次鴉片戰爭，到1890年之前的洋務運動，這五十年間，腐朽的清廷開始還幻想通過發展“洋務”，“師夷之長技

以制夷”，來維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既成局面。從1890年至五四運動的30年，清王朝被一舉推翻，徹底摧毀了封建政治體制。長期依附於封建王朝的儒家思想已魂無體附，必將進一步受到徹底的批判。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的30年，人民解放鬥爭所走的是土地革命、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成功道路。這是對幾千年封建社會經濟基礎的顛覆，當然無暇理會和崇尚長期附屬於封建制度的儒家思想學說。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撥亂反正的30年，經過土地改革、經濟恢復，已然建立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開始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著手研究和總結儒家思想學說，孔子被尊為古代教育家。“文革”極左思潮打破了常規，傳統文化遭到浩劫，孔子及其儒家學說又大受貶斥，橫遭災難。1978年至今的30餘年，是儒學在中國從衰敗走向復蘇的轉換時期。從此儒學不再受冷落和輕視。儒家經典大量整理出版；儒學研究機構成立，研究著作不斷湧現；媒體以圖文聲像的普及宣傳遍地開花；傳統蒙學讀物重新在幼稚教育啟用；孔子研究已有專門學術團體；以孔子為文化象徵的海外孔子學院遍及各地，至今已在近百個國家建立300餘所。繼清華大學為孔子塑像之後，在天安門東側又豎立起孔子巨像，表明尊孔已是國家行為。尊孔的深入是讀經。北京大學正在纂輯整理的大型叢書“儒藏”，更是儒學研究繼往開來的浩大基礎工程。然而這一切僅僅是儒學復蘇的開始。現在和將來，對於儒學復蘇，必然是贊同與反對、樂觀與憂慮、好評與貶斥並存。1905年廢科舉至今百年有餘，此前士人皆誦讀經書，此後士人多不讀經書。按二十年一代人計算，已經是五代人不讀詩書，疏離儒學。所以，時人對於從王朝剝離的儒家學說，參與21世紀中華文化建設的價值和作用，乃至對世界文明將作出貢獻的輝煌前景，實難想像。

近百年來，儒學遭受冷落和批判，與長期所依附的封建政權剝離，這既是儒學的厄運，也是它的新生。儒學剝離的標誌是它所依附的王朝從政治體制的摧毀到經濟基礎的徹底瓦解。儒學剝離經過反復鍛煉，是真金不怕火煉，浴火重生的過程。儒學剝離

是為儒學復蘇作準備的，也是未來儒學振興的必由之路。沒有儒學剝離就沒有儒學復蘇和儒學振興。所以“五四”以來先進的人們對儒家的批判，客觀上正是將儒學從腐朽的依附之體解救出來，使其在未來新世界輔國安民，重放光彩。而且，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那時先進的人們接受了西方先進思想以批判儒學，指明儒學長期依附封建王朝為非作惡的種種弊端，而在實際生活對待事業、父母、友朋、同志，卻常以忠、孝、節、義等作為規範行為的道德標準。這種對儒家思想顯在的批判和潛在的認同，一方面，說明儒學千百年來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中華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另一方面，說明儒學是世上少有的、歷史悠久、蘊藏豐富的寶貴精神財富。任何有影響的學說總與人性相關，而人性從來是個體性與群體性的統一。儒學的本質特徵，就在於立足人的合群本性，因而是一種可貴的群性文化。從對抗宗教束縛中衍生的西方文化的本質特徵則是個性文化。在當今西方文化一味放縱個體生存本能而達到登峰造極的時候，儒家的群性文化在21世紀將日顯其價值所在。儒學復興與中華復興應是同步過程。在已然落地生根的唯物史觀文化的統領和指引下，儒學復興將是中華復興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至於將來儒學與現實生活結合到何等程度，具體情況不得其詳。語云：“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今人不知後人事，無異於昔人不知今人事，亦“篤於時也”。但是可以相信，如果當下從少年啟蒙，普及儒學，經過兩三代人的尊孔讀經，到本世紀中葉，則儒學振興必燦然可觀。

黃君良博士《郭店儒簡思想研究》（下簡稱《儒簡》）書稿，正是中國儒學復蘇時期應運而生的著作。自唐代孔穎達《五經正義》、南宋朱熹《四書集注》先後問世，儒家經典著作文字已經定型。20世紀地下帛書、竹簡出土，給儒學研究帶來新的課題。黃君良君以他多年儒學鑽研的基礎，適時地走進了上世紀末這個關係經典文本的最新課題，在郭店竹簡涉及道家和儒家的文字中，選擇儒簡為研究重點。他吸收別人已有成果，經過鑒別取捨，對竹簡的儒家思想進行系統考索和闡釋。《儒簡》書稿先對

儒家思想作整體歸納，把握全域，後分章展開論述，具體而微。可謂縱橫梳理，至為詳盡。基於作者有關先秦思想文化學識的長期積澱，難能可貴的是《儒簡》既對簡文與經典對照，又將言論與史實互證。這種援史入論，史論結合，論史互參的做法使郭店儒簡的研究更充實，也更深入。總之，這是後來研究者不可繞開的一部難得的學術著作。中國近 30 年儒學復蘇時代催生出這部著作，而這部著作的回報則是功在學林，有益於現在和未來的學術思想建樹。這是可以預期的。

(序言作者為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

二〇一一年三月

前 言

這部書稿是在我以往已發表的幾篇關於郭店楚簡的論文的基礎上逐步增添擴展而成的，書稿沿用了一些我在博士論文中的觀點。幾篇已發表了的論文基本上都保留了本來面貌，有些地方作了適當的刪減、修正，有的卻做了很大的改動。總的來說，全書增補的新內容很多。本書第九章《子羔》篇“三王說”在幾年前已經成稿，一直沒有發表，這次出版做了一些修改，放在郭店儒簡諸篇之後。第一章緒論是我在2008年於臺灣大學哲學系一個研讀會上作演講的講稿，文章沒有發表過。第十章針對全書徵引較多的《大戴禮記》諸篇，即《盛德》、《文王官人》及《孔子三朝記》作年代考證。

關於郭店墓主的身份問題，有一點值得說明一下。我在博士論文中指出，根據墓葬規模和陪葬物品，這位東宮之師並非楚太子的師或傅，而是太子的啓蒙老師。墓中出土的銅頭鵠杖相信是楚太子即位後，當這位“東宮之師”年滿七十的時候，賞賜給他作禮品的。這位太子是誰，我在博士論文中認為是太子橫，即後來的頃襄王。^①現在，我有點不同的看法。關於《六德》成書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是楚人的作品，成書年代該在“戰國的中期，在昭、屈、景三大族共執楚政的宣、威盛勢的時代，最晚也不出懷王統治的中期”。^②按這種猜測，這位太子還該往前推，他有

① 見拙作“Early Confucianism. A Study of the Guodian Confucian Texts”，UMI Dissertation Publishing, 2006，第18—38頁。

② 見本書第七章《六德》。

可能就是楚懷王。懷王熊槐是威王的太子。威王在位十一年（公元前339年—公元前329年），熊槐在這一段時間當太子。由此，這位“東宮之師”有可能在楚宣王時（或之前）教育過年幼的熊槐。

本書關於郭店儒簡的引文全採自李零先生的《郭店楚簡校讀記》。此書是一本流行及重要的讀本。本書在關鍵問題上會參考、比較其他研究者的釋讀。

書中部份文稿於2008年由臺灣大學哲學系佐藤將之教授組織一批日本青年學人分篇審閱過，這些學人包括：日本大阪大學的井上了教授、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後研究員藤卓司博士、臺灣志遠管理學院前川正名博士和臺灣南榮技術學院青山大介博士等。他們各自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非常感謝他們。此書徵引的古籍文獻材料由陳美怡小姐幫忙核對。本書出版得到香港樹仁大學的支助，在此也都一併致謝。

目 录

Preface to 郭店儒簡思想研究 by 黃君良	夏德安
儒家學說的歷史命運（代序）	
——為黃君良博士《郭店儒簡思想研究》作	毛慶者
前 言	1
第一章 緒論—郭店竹書的儒家思想特徵	1
第一節 “人本”思想	2
第二節 教	7
第三節 內與外的劃分	13
第四節 政治思想	17
第二章 《忠信之道》與先秦忠信思想略論	23
第一節 《忠信之道》內容簡述	23
第二節 《忠信之道》與《子張問入官》和《小辨》 的比較	26
第三節 《忠信之道》與子張的忠信學說	29
第四節 《忠信之道》所反映春秋時代的觀念	32
第五節 戰國時代忠信思想考察 ——以《戰國策》為例	34
第六節 戰國時期儒家內部的忠信思潮	42
第三章 《唐虞之道》探微	47
第一節 儒墨思想的結晶	47
第二節 “唐虞”產生的年代	53

第三節	舜地位的冒起與相關的政治理論	56
第四節	戰國時代禪讓的政治事件	65
第五節	“六帝”組合的猜測	66
第六節	唐堯四祀的譜系	72
第七節	唐虞分家的政治意圖	74
第八節	《唐虞之道》的政治思想	76
第九節	《唐虞之道》的其他問題	79
第十節	餘 論	81
第四章	性情論總綱——《性自命出》	84
第一節	性情與人性論	85
第二節	禮樂的本質與尚情	93
第三節	關於人道和心術	100
第四節	《性自命出》的思想傾向	107
第五章	性善論的前哨——《五行》篇	111
第一節	《五行》篇中五行的來歷	113
第二節	《五行》篇內容與稷下黃老道家	125
第三節	《五行》篇解讀的問題	131
第四節	道德內化	137
第五節	簡柔的政治哲學	141
第六章	《成之聞之》的政教論	146
第一節	《成之聞之》與《尊德義》簡述	146
第二節	“槁木三年，不必為邦旗”的政治涵義	148
第三節	《成之聞之》的政治主張	155
第七章	《六德》與楚國貴族政治	158
第一節	《六德》內容簡述	158
第二節	《六德》與楚國的讒言亂政	160
第三節	《六德》對禮文獻的引用	166
第四節	“仁內義外”	172

第八章 《窮達以時》與《魯穆公問子思》——人生的退與進	176
第一節 《窮達以時》探析	176
第二節 《魯穆公問子思》探析	188
第九章 《子羔》篇“三王說”	207
第一節 《子羔》篇簡述	208
第二節 諸侯國追溯功德祖的歷史背景	209
第三節 《子羔》篇三王說的來歷試探	219
第四節 《子羔》篇與《民之父母》	228
第五節 從禹、后稷和契的歷史看《子羔》篇的 思想文化內涵	231
第十章 《大戴禮記》中《盛德》、《文王官人》及《孔子三朝記》 的年代考論	247
第一節 《禮記·月令》的原始形態	247
第二節 《文王官人》的“誠”	258
第三節 《大戴禮記》的成書	264
附錄：年代說明	269
主要參考書目	271

第一章 緒論—郭店竹書的儒家思想特徵

1993年在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出土了一批戰國簡書，李學勤先生考證郭店1號楚墓的年代約為公元前三百年。^① 這批簡書可分為儒家簡和道家簡兩部份。儒簡包括《緇衣》、《五行》、《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六德》、《尊德義》、《語叢》一、二、三和四^②。郭店1號楚墓中最令人感興趣之一的問題是墓主的身份。郭店1號楚墓墓葬為一棺一槨形制，出土器物中有一有字漆耳杯及兩根鳩杖。^③ 根據這些特徵，墓主該是一位士身份的老者（滿七十歲）。漆耳杯杯底有“東宮之弔”四字。有學者釋作東宮之師，有的則釋作東宮之杯。墓主的身分與出土的簡書可能密切相關。我的猜測是墓主曾為太子的老師，不過，他只是太子小時候的老師而已。據《周禮·地官司徒·師氏》的記載：

掌以嬖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師氏的編制“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郭店1號楚墓墓主是一名上士，墓葬的規格完全符合他的身份。由此推測，出土的簡書很可能與他的職業有關。郭店簡書是經過墓主精心挑選、編

① 李學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發現》，《中國哲學》第二十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14頁。

② 龐樸認為《語叢四》更近乎法家、縱橫家。見龐樸《〈語叢〉臆說》，《中國哲學》第二十輯，第327頁。李零指出《語叢四》的內容屬於廣義的道家。見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增訂本，第44頁。

③ 《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第35—48頁。